

寻找宁波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理论圆桌

主持人: 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展模式将以速度为导向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我市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进入发展模式转型期、资源环境制约期、科技逐步加快期,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新思路、新举措,寻找新突破、新优势。不久前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双驱动四治理”,坚持改革和创新驱动,抓好生态、城镇、社会和软环境治理,这是具有宁波特点的政策措施。如何更好地推进“双驱动四治理”,提升宁波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本期“理论圆桌”约请几位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为宁波经济发展寻找突破口。

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刘艳彬:对于宁波来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主线。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来自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经济体的同质化竞争压力正不断加大,国内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我市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进一步显现,原来以低端产业、低附加值产业、低层次技术、低价格竞争和高投入、高消耗为主的经济发展路子难以为继,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立足于转产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以不断提高产业层次。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宁波实际,按照“4+4+4”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快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发展节能环保、生命健康、海洋高技术、设计创意等四大新兴产业,提升发展石化、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电工电器等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符合产业导向的优质产业项目,以增量促结构调整;同时,要制定政策措施淘汰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转移一批产能过剩、效益较差、技术落后的产业,以腾出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要加快体现中心城市功能的金融、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和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业。要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规模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立足于升技术。加快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引导全社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重点支持核心技术突破、创新载体建设、科技金融、科技服务业等,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 and 实验室,推进企业原创性知识生产能力建设,实施企业技术跨越战略。支持创新能力强、基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为一体的新型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大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力度,建设现代化科技孵化基地。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培育计划,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选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技术的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在研发服务、投融资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通过研发资金和投融资支持,支持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实施主体,承接高校、科研机构及其研发人员的科技成果。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立足于强保障。着力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一批重点领域的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完善标准、计量和检验检测技术基础支撑体系,加快建设以国家级检测机构为核心、社会资源共建共享的检验检测服务体系。着力加强金融保障,推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打造企业成长全周期的金融服务链。通过政策引导、资金参股、风险补偿、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发展天使投资、种子基金,集聚海内外各类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基金,为企业科技创新服务。搭建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鼓励发展小额贷款、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加快发展商业银行专营服务机构,促进投贷联动,鼓励信用互助、科技保险等金融创新。深化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完善公开、公平的市场交易体系,放宽非企业业人进入门槛,给予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

主持人:李磊明

嘉宾:方建新(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向鹏(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刘艳彬(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

董明荣(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要加强企业人才保障,加强高水平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努力防控化解企业各类风险

方建新:在当前国际、国内市场形势趋紧的背景下,我市要着力防范和化解企业运行面临的各类风险。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稳,整个经济体系才能稳,社会体系也才能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运行应当遵循市场规律,有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理所应当被淘汰,但是过多的企业由于种种外部风险因素陷入困境,带来众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就应当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并努力防范和化解。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政策风险、成本风险等。

财务风险是当前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传统产业企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风险。在市场形势、货币政策等多方面因素趋紧的情况下,目前我市已有少数企业出现了资金运转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当前产生企业财务风险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企业投资方向过多、过散,特别是一些企业投资于非自己主业领域,由于市场形势转变,资金难以及时回笼而出现困难;二是由于企业互保、联保,因某一个担保圈内的企业出现债务问题而受到牵连,资金被劫,而出现暂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三是由于产品市场形势转变,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价格下降,成品库存,而导致资金困难。近期这些财务风险有扩散和加重趋势,需引起高度重视。在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中,除了有部分由于产品技术落后、政策受限、或经营管理混乱所造成,还有很大部分企业本身生产经营并没大问题,而仅仅是因为投资和担保不当出现资金困难,这部分企业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办法给予解困。

市场风险也是当前企业面临的重大风险。它是企业产品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而导致销路受阻所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特别是在目前外贸形势不佳的情况下,这种风险在不断扩大。在我市的众多中小传统产业企业中,出现这一问题的为数不少。我市许多中小工业企业多以产品外销为主,一旦出口受阻,产品销售就会大受影响。外销产品转内销存在营销渠道、营销模式、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制约。在目前国际市场需求不旺、国际贸易制裁增多、国际市场环境恶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许多传统出口产品制造企业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加上能源、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越来越大。这类企业有其被逐步淘汰的必然性,但如能整合重组,成功转型,仍有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需要政府加以积极引导。

技术风险对当前众多制造业企业来说,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产业技术日新月异,新产品、新技术不断出现,产品更新不断加快,企业面临的技术风险也越来越大。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凭借某项核心技术长期霸占市场,这就需要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我市众多中小传统产业企业总体技术能力不强,生产制造以技术中小型企业或贴牌产品为主,所承受的技术风险就更大。一旦有新的生产技术或更好的替代产品出现,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目前我市制造业企业中,由于技术落后而被驱逐出市场的并不鲜见。这类企业应当在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给予帮助和引导,促使其转型升级。

政策风险对当前企业经营来讲也应十分重视。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会对一些企业带来利好,也会对另一些企业带来压力。特别是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环保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政策变化会对企业经营带来很大影响。如产业政策,国家鼓励发展七大类新兴战略新兴产业,在这些产业领域的企业就会更多地得到政策支持。再如环保政策,一些能耗大、排放多、污染重的生产企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环保政策制约,并被驱逐和淘汰。再如银行信贷政策,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转期续贷由先审后还变为先还后审之后,企业资金周转风险就加大了。还有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的变化也会对企业经营带来很大影响。对这类情况,政府应当加大宣传力度,疏通信息渠道,积极加以引导。

成本风险对我市企业来说也是很大的风险因素。随着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用工成本逐步上升。随着资金紧缺,融资成本不断上升。随着更加严厉的环境政策的实施,排污及处理成本

也不断上升。还有能源、原材料成本、企业用地成本、用水用电成本等也在不断上升。对一些耗能大、占地多、用工多的传统产业来说,生产成本压力尤其沉重。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使企业的盈利空间不断缩小,直至无利可图,企业无法继续经营。对这类企业也应加强引导,通过技术改造、产业转型来求得新生。

面对以上种种风险,企业自身首先必须积极进取,认真应对。作为地方政府部门也应当有所作为,积极加以引导和帮助。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服务平台,如信息咨询服务平台、社会服务平台、技术和人才服务平台、检测检验服务平台等,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营造更好的经营环境。二是要疏理政策,清除不合理的政策和规定,特别是对企业不公平、不公正的政策和规定,着力减少和清除不合理的企业负担,营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三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服务,建立和完善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

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

吴向鹏: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令,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已经拉开。宁波要继续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把营造更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作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围绕继续改善发展环境,率先全面深化改革,再创发展新优势。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与博弈,既要依靠有形的硬环境,更要依靠无形的软环境。发展软环境通常指经济发展中不具有物质形态的非经济因素,是一个地区思想解放程度、市场发展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新的发展阶段,宁波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要进一步优化发展软环境,增创发展新优势。

一、宁波在经济发展软环境治理方面既有优势,又有紧迫性。经济活动是经济主体对发展环境的一种反应。一个地区发展软环境的好坏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宁波来说,在软环境治理方面具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是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积累。长期以来,宁波经济发展的成功,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靠的是发展软环境,靠的是宁波人诚信务实、开拓进取的创业创新精神。历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宁波的土地资源、科技能力并不占优,但是宁波的政府管理竞争力往往占据相对领先地位。二是发展先行区域遇到的各种挑战与问题所激发出的率先变革需求。改革开放初期,宁波在全省率先推行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上世纪80年代,宁波率先推进开发区建设,创新港口开放管理体制;上世纪90年代宁波实施国企、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近年来,宁波在社会管理、行政审批、城乡建设等领域推出了一批新的体制改革举措,破除影响发展环境、制约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当前,宁波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宁波的竞争劣势正在逐步弱化,这实质上是经济素质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反映。我们要充分认识变革的时代紧迫性。无论是世界各国还是国内各省市都在积极推进以优化软环境为重心的变革。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地2005年—2012年营商环境改革措施的研究显示,简化开办企业的程序最受重视,也是改革最多的领域。在这8年中,149个经济体共进行了368项改革,这些改革将开办企业平均所需时间从50天减少到30天,平均成本相当于人均收入的89%降低到31%。从国内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公平竞争、开放透明、内外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因此,改善地区的软环境就不能主要靠上级部门给予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优惠政策,而应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提高服务质量。目前各省市都在积极优化发展软环境的竞赛中。新的历史时期,宁波要增创软环境新优势,不仅需要务实精神,更需要进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

二、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关键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影响发展软环境的因素很多,包括自然的、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等许多因素。理论和经验均表明,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政府始终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虽然政府对诸如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力有限,但在产权保

护、市场监管、赋税征收、政府管理等方面却可以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刘奇书记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新时期宁波在城市竞争和软环境治理方面,要比拼服务的效率、比拼服务的灵活、比拼发展的环境。各级政府要主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发展软环境作为政府理政的重要职责。一是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以简政放权为重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部门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二是营造激发活力的商务环境,加快建立水、能源、环境容量等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着力加强信用建设,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三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继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决杜绝执法不公、不严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四是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切实加强正面宣传引导,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支持创业、激励实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人人努力优环境、合心合力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全面提升宁波城市国际化水平

董明荣: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和发展格局发生了许多重大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扩大开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国际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要求。现代化是国际化的基础和依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则国际化能力越强;国际化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与关键动力,国际化水平提升会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因此,宁波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必须把城市国际化作为一条基本路径和强大动力,充分发挥其龙头带动和引领作用。

国际化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城市国际化成为国内许多城市的战略选择,上海、南京、深圳、杭州、长沙等城市都对城市国际化作出专门决策部署。我国城市国际化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特点:一是深化扩大国际合作成为推进城市国际化的基本路径;二是全方位国际化成为推进城市国际化的共同方向;三是打造开放门户成为推进城市国际化的战略支撑;四是培育功能特色成为推进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手段;五是体制机制创新成为推进城市国际化的关键动力;六是城市群联动成为推进城市国际化的重要形式。

从宁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城市国际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化起步探索阶段(1978—1987年),以港口加快开发和外贸、外资的起步发展为特征;第二阶段是国际化突破推进阶段(1987—2008年),以经济国际化突破加速和人文国际交流与合作逐步发展为特征;第三阶段是国际化转型提升阶段(2008年以后),以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全方位国际化加快推进、国际合作深化扩大为特征。

新时期,宁波推进城市国际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加快形成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走出一条符合时代特征、具有宁波特点的城市国际化新路子,到2016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and 长三角亚太国际门户主要城市,并实现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开放平台体系支撑力、国际合作带动力、社会文化软实力、综合环境承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特色的城市国际化,包括经济、港口、基础设施等领域国际化,及社会、人文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与接轨内容和要求。宁波城市国际化的重点领域应涵盖开放经济、开放合作、城市创新、社会文化、综合环境等五大领域,在每一个领域,都要规划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试验区;积极探索国家深化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示范区;积极探索国家大型国际会议、高档会展、重要赛事等。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并行的发展新阶段,城市国际化面临的许多难点和障碍需要改革创新来解决。要着力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增强城市国际化的活力动力,突破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难题制约,并积极争取国家改革创新政策在宁波的试验示范。比如,积极探索和申报国家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试点;积极探索国家深化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示范区;积极探索国家大型国际会议、高档会展、重要赛事等。

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观点聚焦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放眼2014年,能否按照既定的改革蓝图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国经济走向如何?专家学者梳理预判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经济基本面依然总体趋好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目前全球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改革效果最显著,哪一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比较各国的改革方案以及改革决心,我们非常幸运地看到,中国的认识最清楚、决心最大、动作最快,而且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目前全球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改革效果最显著,哪一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比较各国的改革方案以及改革决心,我们非常幸运地看到,中国的认识最清楚、决心最大、动作最快,而且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目前全球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改革效果最显著,哪一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比较各国的改革方案以及改革决心,我们非常幸运地看到,中国的认识最清楚、决心最大、动作最快,而且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经济增长具备诸多积极因素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王文波认为,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复杂严峻局面。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少积极因素:一是宁波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必须把城市国际化作为一条基本路径和强大动力,充分发挥其龙头带动和引领作用。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王文波认为,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复杂严峻局面。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少积极因素:一是宁波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必须把城市国际化作为一条基本路径和强大动力,充分发挥其龙头带动和引领作用。

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没有一定的增速,很难把经济工作搞好。

这是保就业的需要。据有关方面测

理论漫谈

看法,即对客观事物所抱的见解和观点;办法,即处理事情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事当前,既要有看法,更要有办法;不能光有看法,没有办法。”针对某些党员干部的“行为偏好”,一位领导同志曾十分严肃地指出。

看法与办法,其实同属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为影响的,不能“拆桥桥、路归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对客观事物和前进道路上的矛盾问题有了科学的分析判断,

看法与办法

江海

形成了正确的见解,我们才能据此有针对性地拿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一旦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出现偏颇,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就必然出现偏差,甚至有误入歧途的可能。同时,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有效性,反过来又可以检验看法的正确性。

把正确的看法转化为正确的办法,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大到治国理政,小到处理日常事务,莫不如此。比如,“如果庸政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是党中央对反腐问题的判断,而去年以来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出台八项规定等制度、对各地开展巡视工作等等,就是中央在系统调研、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具体办法;“水、气、土壤污染问题不加快治理,我们的生存将面临挑战、发展将难以维系。”这是全社会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看法,而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浙江“五水共治”方略、我市“双驱动四治理”决策部署等,就是在广泛吸纳民意后推出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办法。

算,目前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概能创造130万个甚至15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现阶段我国保就业、将城镇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GDP增速就不能低于7.2%。这是调结构的需要。只有GDP增速保持在7%—8%之间,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快速推进,人力、资金、技术才能得到充分保障。这是促稳定的需要。如果经济活跃度过低,会带来企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裁减员工、投资减少。此外,还可能引发金融风险。这也是增信心的需要。经济一旦失速,进入惯性下滑轨道,信心缺失与经济下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基本盘将受到巨大伤害,重启的难度和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全面深化改革

在新一轮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被强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认为,深化农业改革,应对农业发展挑战,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从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农民和市民同工同酬、同城同权入手,保障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提高竞争的公平性;从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入手,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鼓励经营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等。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认为,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回归实体经济。当前应以公司债券为基本抓手,推进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展开中国金融体系再造的工程。在金融运行中,存在着众多多可用公司债券予以化解的矛盾:货币供应量高企、银行信贷资金的期限错配、推进债务率降低、推进资产证券化、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熨平股市波动。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财税体制”指的是四件事: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管理、财政体制。由此,财税改革要注意整体的改革方向,四方面都需要有所顾及。围绕这些改革方向,财政收入主要是改革税收结构,财政支出要着眼于稳定税负和调整GDP分配格局,预算管理要实现“规范透明”,财政体制要坚守“分税制”。

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如何治理产能过剩?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认为,短期来看,应避免严重产能过剩行业整体陷入生存危机与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产能调整与供需调节则主要依赖市场机制,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是化解过剩产能最为有效的手段;从长期来看,完善市场机制是根治产能过剩之道,具体来说,治理产能过剩的关键在于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矫正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的体制缺陷,并增进市场机能,以充分发挥市场利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平衡、淘汰落后企业和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高效率性。

(李伦)